

回望中共百年侨务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侨务工作

张春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海外侨胞，重视侨务工作，把“考虑和制订有关华侨的各种政策，作为国家总的政策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根据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世界格局演变、海外侨情特点与变化，党和国家把侨务工作与国内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及对外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初步确定了我国开展侨务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奠定了侨务工作的重要思想和政策基础。

首先，党和国家高度评价海外侨胞对中国革命贡献。充分肯定他们对新中国的热爱与感情，将海外侨胞与国内各阶层人民一道，视为“极其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提出“保护华侨的利益，扶助回国华侨”指导方针和基本原则。在新政协中，陈嘉庚、司徒美堂、蚁美厚等6名华侨代表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在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了“保护

国外华侨的正当的权利和利益”。这一规定成为制定所有侨务政策的法律依据。

其次，设立了侨务工作机构。为了体现华侨的地位，保障中国侨务工作的有效开展，1949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设华侨事务委员会，主持保护侨益的国家行政工作，后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侨务委员会。1956年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成立，著名侨领陈嘉庚当选为主席，在加强与海外侨胞联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侨务机构的不断完善，为制定和执行侨务政策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

第三，确立了国内和国外侨务工作方针。从工作内容和对象划分，新中国的侨务工作大致可以分为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

从国内来看，主要包括：根据侨乡特点制定适宜政策，推进侨乡土改；发动和组织侨眷、归侨参加生产和各项建设；贯彻过去服务侨

胞、侨眷，便利侨汇的既定方针；协助华侨回国投资；救济归国难侨；组织侨眷、归侨的教育工作；安排回国升学华侨学生；大力开展归侨、侨眷宣传教育工作等。

从国外来看，主要包括：开展华侨爱国大团结工作，团结一切爱国侨胞，组织华侨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护华侨正当权益，反对歧视、迫害华侨；开展华侨文化教育工作，发扬华侨兴学办报的传统，广泛介绍祖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设的伟大成就。这一时期侨务工作的一个重点就是与有关国家协商解决“双重国籍问题”。为消除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疑虑，打破帝国主义制造的华侨是“第五纵队”的谣言，促进海外侨胞的长期生存与发展，我国政府鼓励华侨自愿选择当地国籍，成为所在国家公民；要求华侨要遵守所在国家法律，不得参加当地政治活动等。此后，海外华侨社会逐

步转变为华人社会。

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得到全面发展，侨务政策日益完善。

一是明确了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地位作用。党和国家明确了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宝贵资源和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努力，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发挥他们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积极作用，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为新时代侨务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二是明确了侨务工作原则和法律保障。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明确侨务工作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严格区别华侨和外籍华人国籍界限；积极稳妥，公开合法；有利于海外侨胞在当地的长期生存和发展，有利于发展我国海外侨胞住在国的友好合

作关系，有利于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对于归侨侨眷和华侨遵循“一视同仁、不得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方针。199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其后又进行了修订；全国30个省市区颁布实施了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有关部门和地方根据形势发展制定了多项吸引海外侨胞回国创新创业、维护其国内权益的法规和政策，形成了法律保障体系。

三是拓展了侨务工作领域与任务。明确要充分发挥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在推动我国现代化建设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方面的积极作用，在传播中华文化方面的独特作用，在增进中国人民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方面的桥梁作用。

进入新时代，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党和国家的侨务工作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指导，更好地凝聚侨心侨力，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助力形成海内外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生动局面，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作者系中国华侨华人研究所所长、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

百年航程 有“侨”精彩⑫



图为廖承志看母亲何香凝作画。（资料图片）

廖承志

创立「八办」为抗战筹措经费

要素敏

抗战时期，如何以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凝聚海外人心成为海外宣传的重要任务。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廖承志，及时组织在香港的新闻界知名人士创办了《华侨通讯》和国新通讯社，对国内抗战形势进行全面报道，转载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抗日战争的分析文章和著作，刊登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的文章。其中很多文章被南洋华侨报刊转载，海外侨界反对投降、反对国民党搞摩擦、坚决要求团结抗战到底的主张占了上风。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规定，海外侨胞的捐款全部由政府统一接收、统一分配，八路军、新四军几乎得不到。后来，南洋进一步华侨团体派代表专程去武汉找到中共代表团，提出建立八路军、新四军接收华侨捐款的独立渠道，却被当时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所拒绝。华侨代表到香港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廖承志对华侨捐款给八路军、新四军表示欢迎，他说：“毛泽东、周恩来在与国民党交涉中早就提出分筹分汇的建议，但没有结果。你们可大张旗鼓地为八路军、新四军募捐。”此后，廖承志又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启事，通告各地侨胞，凡是捐赠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款项和物资，一律由“散军驻港代表廖承志收转”。启事在南洋华文报纸上转载后，华侨捐款的积极性大为提高。

1937年10月的一天，廖承志匆匆赶到毛泽东在延安居住的窑洞，听取毛泽东关于在香港设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指示。鉴于延安和八路军、新四军都深处敌后，与海外华侨、世界其他国家联系不便，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简称“八办”）。

接到建立“八办”的指示，廖承志于1938年1月到达香港。在与潘汉年、吴有恒、连贯、张唯一、李少石、廖梦醒等人研究后，决定在香港皇后大道18号开一家“粤华公司”茶叶商行作为掩护，后楼就是“八办”。在廖承志的出色领导下，粤华公司生意兴隆，办事处充分利用香港特殊的政治环境与地理位置，工作开展得卓有成效，成为八路军、新四军与海外联系的重要通道，扩大了中共在海外的影响。

廖承志、潘汉年等人在研究以“粤华公司”为办公地点时，也未雨绸缪设立了南华药房、义顺源等备用地点。“八办”的出色工作引起了日本的忌恨，连续向港英当局提出“抗议”。迫于压力，港英当局在1939年3月11日清晨突然包围粤华公司，逮捕了连贵等5人。经周恩来反复交涉，被捕人员最终获释。经此事件，“八办”认真分析了形势和处境，决定撤销粤华公司这个公开的机构，采取化整为零的形式进行联络和办公，先期廖承志、潘汉年为应对意外情况而设立的备用地点，此刻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八办”工作没有因为此次被捕事件受到很大影响。

为了防止日本和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做好特殊环境下的工作，廖承志、潘汉年组织“八办”的同志开展隐蔽斗争方法的学习，制定了严格的纪律和秘密工作要求。例如，办事处成员不准照相，尤其不能把照片送给别人；不得与亲戚、同学、朋友通信来往；出门或者返回时要注意是否有人跟踪；自己的住处要保密等。这些纪律规定和执行情况十分成功。此后，研究人员对“八办”历史进行回溯时，竟然没能找到一张“粤华公司”的老照片，“八办”人员遵守纪律之严，可见一斑。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⑧

挪威侨胞马列——

细品舌尖上的中国巨变

本报记者 严瑜

年过七旬的挪威侨胞马列，从事餐饮行业已将近50年，是一位厨艺精湛的“杭帮菜”烹饪大师。

和食物打了一辈子交道，马列说起中国人舌尖上的巨变，感慨万千。以下是他的自述。



马列近照

苦日子多动巧心思

最近，我重温了讲述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历程的多部红色经典电影。其中一些镜头和故事让我感触很深：红军长征途中，党中央在饭桌上商议事情时，几位领导人的面前只摆着一两个番薯或玉米，食物非常匮乏；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被封锁，以八路军第359旅为代表的抗日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处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好江南。

从吃不饱、穿不暖到不愁吃、不愁穿，中国人民告别饥饿，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最要感谢的就是中国共产党。

我出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也曾经历过缺衣少食的苦日子。回想年少时，印象最深的是每天放学后，母亲都会叫我去家附近的菜场捡些卷心菜叶子，回家做菜用。那时，我们兄弟姐妹5人，跟着父母住在杭州的“大墙门”里。一个院子挤了十几户人家，都是平头百姓，能吃的东西很少。

我上初中那会儿，赶上困难时期。买粮、买肉、买油都得凭粮票、肉票、油票。还记得，凭粮票领回的不全是大米，还有杂粮粉、玉米粉。院里许多邻居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跑到新华书店去找教做点心的书，学着用杂粮粉掺和少量面粉，制作各式各样的点心。邻居们尝了都觉得好吃，纷纷来找我学。

从那时起，我心里有了一个念头——去专业学校学烹饪。后来，我如愿做了厨师，并成为国家高级烹饪技师，在杭州餐饮业渐渐有了名气。

改革开放初期，党和政府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非常重视“吃”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杭州市总工会生活部干部找到我，希望组织一个厨师培训中心，对杭州市内工矿企事业单位及周边部队、学校的厨师进行分批培训，提高这些单位食堂的菜肴质量。

我和其他几名厨师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想了不少点子。比如最初，在一些食堂，2角只能买一小块红烧肉，我建议改成一荤一素，在肉馅中加入豆腐、藕丁等食材，做成一道狮子头，再配一个炒青菜，这样就能吃得更丰富、更营养。

从1982年到1989年，我们一共培训了4000多名厨师，还在当地电视台举办烹饪大奖赛，鼓励各单位的厨师们分享烹饪妙招，用有限的食材做出尽可能多的花样，让职工们不仅吃饱更要吃好。

中餐厅增添“中国味”

1990年，我在朋友的邀请下出国发展，成为挪威一家国际餐饮公司的大厨。刚到没多久，我便接到一个重要任务——去挪威首都奥斯陆，为当时的首相及其亲友做一桌中国菜。宋嫂鱼羹、炸春卷、宫保鸡丁……传统地道的“中国味道”让首相赞不绝口。

4年后，我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有了第一家属于自己的中餐厅。那时，海外虽然已有不少中餐厅，但菜品普遍较为简单。像我所在的挪威，大多数中餐厅以做5道菜为主：春卷、炒饭、炒面、宫保鸡丁和咕咾肉。一些老侨告诉我，他们曾是远洋货轮上的海员，留在挪威生活后，为了谋生，便租下一间房子，挂起红灯笼，就把中餐厅开起来了。至于这5道菜究竟卖了多少年，他们也记不清了。

但在我出国之后，情况大不一样了。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海外侨胞传播中国饮食文化的意识逐渐增强，一大批和我一样的专业厨师走出国门，将正宗的中餐做法带到海外。进入21世纪，中外文化交流越发热络，国内各地赴国外的考察团越来越多，来中餐厅吃饭的中外朋友也随之增加，进一步推动了中餐在海外的传播。外国友人经常在就餐后向我感叹：“原来中餐厅有这么兼具美味和艺术的菜肴，我们今后要经常来！”

这些年，我们这些“走出去”的海外中餐厨师又“走回来”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国家越来越重视中国饮食文化等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近几年，浙江省多次举办海外中餐烹饪技能培训班，邀请全球各地的华侨大厨“回炉锻造”，提升中餐烹饪技艺和企业管理能力，以此更好地促进海外中餐业薪火相传。

近两年，我回杭州探亲时就赶上过几期培训班。当时，许多参加培训班的侨胞都兴奋地告诉我，前来授课的都是“杭帮菜”大师，课程内容包括营养健康讲座、烹饪实操等，非常丰富，他们受益很多。

如今，不仅海外中餐厅发展得越来越好，普通侨胞餐桌上的“中国味”也越来越浓。我曾问过一些老侨：“你们早年在海外都怎么过年？”他们说大多就简单炒两个菜，没什么仪式感，不像现在，家家户户到了春节便张罗一大桌子美味佳肴，有时还会邀请周边的外国邻居一起来品尝中国菜、欢度中国年。

小面馆化身“网红店”

刚去海外发展那些年，忙于生计，我回国次数比较少。每次回到杭州，都是和父母及兄弟姐妹在家里聚餐。

渐渐的，我回来的次数多了，在家吃饭的时间反而少了，因为大家总是约着去餐厅吃。国家发展了，国内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吃得更加讲究。

有一年回国，家人告诉我，在我曾住过的“大墙门”对面，一家过去门面很小的面馆上了国内火爆的美食纪录片节目，竟成了“网红店”，每天门口都排满了长队！我听了好奇，专门去尝了尝，熟悉的面汤里加了许多食材，增添了不少新鲜感，比印象中的味道更好了！老板对我说，要做好这一碗面，做出特色，做好饮食文化的传播。

出国前，杭州城里有哪些知名的餐厅，我基本都能数得过来。现在，我可不敢夸海口了。在杭州，全国各地的的美食琳琅满目，每年新开的餐厅比比皆是。老百姓不仅有了更多选择，也更注重健康饮食。我的一些老同学当了爷爷奶奶，常会咨询我怎样给孙辈做更有营养的早餐，不再像我们过去那样只是简单地吃一根油条、喝一碗豆浆。

变化不只发生在国内。中国强盛了，人民富裕了，我们侨胞在海外也更自信、更有底气。我不仅要“中国味”俘获“外国胃”，更要给外国友人讲好餐桌上的中国故事。

2016年G20杭州峰会前夕，我策划制作了一本小册子。每一页，四句诗，一段话，一张图，娓娓道来杭州的人文地理与美食文化：“东坡肉”记录了苏东坡在杭州修建苏堤时与百姓共享美食的爱民之心；“桂花栗羹”源自中秋之夜天上人间同赏湖景的美丽传说；“宋嫂鱼羹”则与宋高祖巡游西湖时的一次偶遇有关……我写了150多个故事，并在小册子中专门配上英文译文，外国读者读来一目了然，从中可以了解更加有声有色的中国。

讲文化，也讲发展。杭州千岛湖的鱼头浓汤非常有名。其实早年，那里的生活非常贫穷。后来，附近的老百姓开动脑筋，在千岛湖中搞养殖，养出来的鱼特别大，他们就顺势创新出了“千岛湖鱼头浓汤”这道菜。如今，老百姓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这样的故事，我给外国友人讲过许多。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发展日新月异，舌尖上的巨变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图为马列制作的菜品——鲜虾蹄膀、狮子头。（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图为马列制作的菜品——鲜虾蹄膀、狮子头。（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